

林东山□著

流云

无边

北京林出版社

流云

学林出版社

林东山 著

(沪)新登字第 113 号

责任编辑：雷群明

封面设计：桑吉芳

策 划：钱沛霖

流 云

林东山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 插页 6 字数 90,000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0 510-515-X/I·522 定价：6.00 元

序

曾 炜

有人以一本书一举成名，得到荣华富贵。因此，不少人“自投罗网”，许身文学。但最后大多是业绩平平，甚或一事无成，能载入文学史者无几，弄不好还“粉身碎骨”。故有人说：“文学是危险的职业。”鲁迅也教训儿子不要当空头文学家。这些教训是尽人皆知的，但还是有人迷恋文学。固然，这些人大都是出于爱好，也有出于决心为文学事业献身的。林东山同志毕业于名牌工业大学，满脑子数据、逻辑思维，却不知怎么的也爱上了这充满感情色彩的、尖锐地反映意识形态的文学；特别是他这十多年来，事业已有成就，又身居领导岗位，对文学爱好依然不减，坚持在百忙中业余创作，这是可贵的，不能不对他表示赞赏，钦敬他的毅力和勇气，及把专业和业余的位置摆得恰当。

林东山同志已步入中年，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域的事业上也已有相当基础，但在文学上还处在起步阶段，按文学界一般习称，还是青年作者。

从他一九七九年写《陷溺》到现在，在不断创作中，已取得一些创作经验，且已逐步走向成熟。他的文字相当流畅，颇有文采，这和一些初学写作者的文字粗疏、沙石甚多有所不同。这大概是作者有大学毕业的文化素质，加之平时酷爱文学，读过许多经典文学著作有关。可以说，他的起步是较高的。

从小册子的作品来看，是作者初试锋芒，是在不断前进中。像一九七九年写的《陷溺》，只是现实生活加上作者憎爱的记实。再经《信心》、《爸爸与海》等试笔，到了《选择》却大大跨进一步了，对人物作了较细致的刻画，布局上也下了功夫。到了《梦境》，又有了突破，作了新的尝试，颇有浪漫主义色彩，富有想象力。中篇《流云》，作者已把自己熟悉的生活投入，加以发挥，创造出几个较有性格的人物。路是这样走过来的。可以肯定，总有一天，作者会把长期积累下来的在工业战线上的斗争生活加以概括、提炼，写出反映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杂斗争的雄篇巨著的。

不少当领导干部的作家，最初并未意识到自己将成为作家。远的不说，广东的吴南生、杨应彬（杨石），数十年来从事领导工作，由于他们爱好文艺，有颇丰富的艺术细胞和工作经验，因而他们在业余创作上甚有成就，吴南生不仅是书法家、诗人，还写了长篇《革命母亲李梨英》；杨应

彬也写了大量全国甚有影响的散文。他们并不急于成名成家，却自然而然地成为作家。我想，东山同志也可以他们作榜样，在工作中创造出优异成绩的同时，能经常看看书，作些笔记，长期积累和思考，提炼自己泡在生活海洋中的生活，一有机会便执笔，那时正是怀胎十月，自然会产下胖小子的。

当《流云》出版之际，匆匆草上感言，是为序。

一九九三年春

目 录

序.....	曾 炜
--------	-----

报 告 文 学

探求与希望.....	(1)
------------	-------

小 说

流云.....	(11)
陷溺.....	(100)
信心.....	(117)
选择.....	(125)
梦境.....	(140)

散 文

爸爸与海.....	(148)
后记.....	(151)

探 求 与 希 望

——访伍正谊教授和汕头 大学精神卫生中心

1934年，在苏州东吴大学蕴育着春色的草坪上，静静地躺着一位颀长的青年。他左手握着一卷刚出版的杂志，右胳膊肘支在毛茸茸的嫩草上，眼睛专注地望着湛蓝的天空，仿佛在寻找着什么。他显得很文静，但在他的生命里，却涌动着一股激流。这个刚22岁即将毕业的生物系学生，此刻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东方传统文化的碰撞，欧美精神病学正在酝酿着的一场变革，寻求中国自己的精神医学道路的历史责任感，终于使他走上了一条寂寞之道。并且义无反顾地苦苦拼搏了半个世纪。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精神医学专家、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的创始人伍正谊教授。

在风光旖旎的桑浦山麓，在鳞次栉比、晶莹似雪的汕头大学宏伟的学宫旁边，有一组独具匠心的建筑群。它的中心是草木葱茏、花香扑面的玉兰园，东西两侧各有一处白墙绿瓦的庭院。小巧的院子四周，环列着一排精致的二层楼房，这

种布局很像北京的四合院。玉兰园北面，有一个八角形大厅，大厅两边，伸出两条古色古香的长廊，把玉兰园环抱在怀里。整个建筑群错落有致，清幽雅淡。这便是汕大精神卫生中心。远处仿佛回响着琅琅的书声，近处不时传出一两声低低的笑语。在苍翠的树荫下，在绿茵茵的草地上，到处有三五成群、衣着入时的男男女女。他们神色安闲，步履轻松。没有人会想到，在这些自由自在的红男绿女中间，多数是在精神的桎梏中刚刚挣扎出来，甚至曾经用铁链锁着送进来的精神病患者。

一提起精神病院，人们往往联想到一处处紧闭的铁门，一双双伸在铁栏杆外乞讨自由的枯臂。穿白大褂，行走匆匆的医生居高临下俯视着病人；穿条纹病服、步履蹒跚的病人痴呆地仰视着护士。医患关系就像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一边是对病人的鄙视、恐惧、怜悯，一边是病人的怀疑、乞怜或反抗，唯独缺乏的是将病人当做人所应给予的尊重。在我国，很多疾病都得到社会的同情和关注，但人们对精神病却很反感。有的农村把精神病人锁在猪圈里，或把精神病人看作神鬼附身。旧中国甚至把精神病人踩死打死，法国也发生过把精神病人烧死的事。社会上对精神病人的偏见也根深蒂固地影响到精神病院的格调。这种情况，曾经多少次刺痛着伍老的心。他永远也忘

不了在北京医学院当教授的一件往事。有一天，他看到一个 16 岁的女孩子，坐在墙边，哭得很伤心。他走过去，问她哭什么。她说：“我有一个同学，她得了痢疾，老师、同学都去看她，还送给她鲜花。我住院两个多月了，却没有一个人来看我。爷爷，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一个 16 岁少女的眼泪，一点点一滴滴灼烫着一个 60 岁老人的心。难道因为她是精神病患者，就没有一点点孩提的童真，少女的灵性，青春的火花！一个患精神病的少女，向一个精神医学专家发出心灵的呼吁。这件事，像锤子一样敲击着伍老的神经。

长期以来，人们对精神活动和这类疾病的本质普遍存在着不少错误的认识。精神病人仿佛不是病人，而是来自另一神秘世界的怪物。是蓬头垢面、毫无理性的疯子。精神病院被称为“疯人院”。既然是疯子，因袭的做法便是禁锢和用药。既然是疯人院，为了安全，就免不了重门深锁，铁窗高墙。多少年来，这种观点是那样顽固，使人们经常忽略了精神病患者作为人的基本属性。忽略了精神病人首先是一个人，他们也需要爱抚，需要慰藉，需要心灵的沟通，需要使他们受到压抑的欲望得到正确的疏导。

中国宝贵的医学遗产的启示，各国精神病学家所倡导的心理疗法，中医主张的辨证施治，患精神病少女的眼泪，几十年与精神病人接触的经

验，使伍正谊教授在耄耋之年产生了一种执著追求的愿望：要创办一所崭新的中国式的精神病院。他明确地提出“建筑园林式，生活家庭式，管理开放式，治疗综合式”的构想。带着这种愿望，他风尘仆仆来到素有海滨邹鲁之誉的潮汕平原。他的赤诚感动了省市和汕头大学的领导，他们答应在桑浦山南麓、汕头大学旁边划出一块地作为开办中心的地址。香港商界巨子、捐巨款兴建汕头大学的爱国同胞李嘉诚先生也热心赞助，承担全部建设费用。于是，按照伍老的构思，中心在1984年完成设计，1987年3月竣工，在南京精神病防治院和全体医护人员的努力下，于1988年1月25日开始接待病人。伍正谊教授以他76岁的高龄，亲自主持精神卫生中心的工作。在夕阳的金色余辉中，他竭毕生精力从事的精神卫生事业，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任何一个到中心参观的人，都会有一种新风扑面、的感觉，都会不知不觉地被带进一种友善、理解、愉悦的氛围之中。

在这里，病人享有充分的自由。典雅的长廊，敞开的玻璃门，把各个病区连成一个快乐融洽的大家庭。

每当皓月中天，南风习习的夏夜，或是晨曦铺地、暗香浮动的冬日，常有三三两两的病人，或在玉兰园，或在棕榈园，愉快地向医护人员倾

吐心曲。在窗几明净的办公室里，常有医生在耐心诱导病人，认真地倾听他们内心的“秘密”，满腔热情地解答他们的疑惑。这种集体的和个别的心理治疗，消除了病人的逆反心理和恐怖感。他们排除了被遗弃被孤立的感觉，回到“社会生活”中来，重新找到生命的价值。

伍正谊教授高度重视家庭意识在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精神观念中的地位，男女病区都设计成四合院的模式。每间病房安排二到四个床位，配有沙发等家具，有独立的卫生间。休息室里放着报纸杂志，还有电视机，起居室里则配备有洗衣机。病人从家庭来到中心，犹如从小家庭来到大家庭。他们穿着家常服式，而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医护人员，也不是穿白大褂，绷着脸的“看守”，而是衣着入时、笑口常开的朋友。医生护士喊病人，不是喊“15床”、“18床”，而是一律以爱称尊称相互称呼。在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有一八角形大饭厅。在这里，医护人员和病人在同一个菜盆打菜，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有一个病人，连她母亲做的饭都不吃，怕有毒药。可是在这样亲密无间的环境中，她却吃得很香。

这种家庭式的治疗办法，消除了病人的心理负担，使病人、医护人员和周围环境和谐地融为一体。

在漫长的医疗实践中，伍正谊教授深深体会

到：人的思想、情感不是光靠药物就能治疗得了的。有一次，一个病人（不是精神病人！）到北医附属医院看病。他拿着药，刚走到公共汽车站，就顺手扔到沟里去了。伍老忙过去问这个病人，为什么把药扔了。这个病人说：“狗屁！”其实，医生给他开的药是对的，但因为他在向医生叙述病情时，医生不耐烦，还未等他讲完就开出处方，结果，对症下药也得不到病人的信任，被当作“狗屁”。医患关系不沟通，再好的药也收不到好的效果。因此，伍正谊教授在创办精神卫生中心时，就明确提出以药物治疗为基础，以心理治疗为主导，配合工作治疗、文体治疗、环境治疗的综合治疗理论。

在精神卫生中心，病人在宽松的环境中过着有规律的生活。在工娱楼，医生和病人一块打桌球，一起参加乒乓球比赛。病人在铺着宣纸的桌面上，泼墨挥毫。工疗房里，七八个病人在专心制作小工艺品。陈列室里，摆满病人制作的各种各样精致的小玩意，有用易拉罐做的椅子，各种颜色布片拼成的小孩头像，有描写卫生中心医患关系的木偶剧道具，有病人创作的书法国画……在伍老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用了十几年的玻璃杯，外面套着一个用尼龙丝编成的杯套，这是一位病人送给伍老的礼物，也是工疗的一个成功的例子。这位病人有“错听”症状。她一睁开眼睛，就“听”

到有人在骂她。于是，就扯开嗓门与“别人”对骂。后来，让她学编织，因为思想集中在编织上，就逐渐感觉不到“别人”在骂她。慢慢地，她相信这是自己的错觉，是一种病态，就不再对骂。

伍老说：“我每次出国，总有人要我打听国外有什么新药。我遗憾地发现，国内有许多药连国外都不知道。但是在美国，几乎每一家精神病院，都有一个花房。病人养花种草，陶情悦性。在工作中得到治疗，同时也创造了财富。在这一方面，民主德国的精神病院做得更好。在那里，国家只供给少数的物资，但病人却吃得很好，工疗使他们丰衣足食。

通过工作治疗、文体治疗，病人的精神逐步集中到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中，从而扳正了被扭曲的心轨。

有一个患者，她的亲人都在海外，就在她生日那天，她妹妹特地从香港回来，还带来一个蛋糕，准备为姐姐祝寿。到了卫生中心一看，许多人围着一个大蛋糕，又是拍手，又是唱歌，整个卫生中心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她万万没有想到，站在这群人中间，被爱心和友情团团围住的寿星，竟是自己的姐姐。那天晚上，姐妹俩躺在一起，谈到天亮。妹妹临走时，紧紧拉住医护人员的手，热泪盈眶，连声说：“我真没想到，姐姐在这里生活得这样好……”

精神卫生中心帮他们拨开头顶的阴霾，找回失落的年华。医护人员用一双双灵巧的手，抚慰着一颗颗破碎的心，用一颗颗灼热的心，指引着一个个迷失的灵魂。

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代表着一种探索，一种信念，一种深切的同情心，一种崭新的医德，一种无私的奉献。

但是，中心刚成立时，这个可容60张病床的实验基地只有两个病人。人们对在汕大这样现代化高等学府旁边，放着这么一个治疗精神病人的所在，是那样忧心忡忡。他们生怕精神病人会跑出来，会拿着凶器跑到学校来捣乱。人们头脑中那种充满歇斯底里的鼓噪，像犯人一样带着手铐脚镣，到处充满可怕的痴呆的目光，手持凶器追杀病友的乱糟糟的场所，与桃李灼灼、清新明丽、黄宫栉比，书声琅琅的高等学府，是这样地格格不入。于是，有人提议将这处建筑改为职工俱乐部。甚至某系在中心已经开办以后，还跑来商量借用举办舞会。有的认为伍老的想法不合潮流，他的思想大大超前。但汹涌在伍老胸中的崇高使命感，使他决心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把中心办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个原先只有60个床位的中心，最多却收过90个病人，至今共接收了300多位患者，其中治愈率40%，显著进步率30%，总有效率达90%。

伍正谊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创造出中国精神医学界上的挪亚方舟。

然而，迈出这一步固然艰难，要朝着这个方向坚定地走下去，就更不容易。尽管汕头大学有这么一所精神卫生中心，尽管已经78岁高龄的伍正谊教授仍然壮心不已，但是，面对着患病率高达12.6%，并且正以3%的速度递增的精神病人，面对着精神病患者住院率只有0.6%的落后局面，面对着全国1000多万重性精神病人只有20%得到住院治疗机会的状况，那么，仅有60个床位的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与其说是一种尝试，不如说是一个象征。

伍正谊教授积50个春秋的精力，终于点燃了这把星星之火。他现在渴望的是理解，更多人的投入，更广泛的社会舆论的支持，中心全体医护人员持之以恒的努力。就拿“生活家庭式”来说，医护人员与病人在一起吃饭，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忙碌了一天，谁不想在饭桌上轻松一下，谁不想享受更多的美味佳肴。但与理智尚未健全的病人在一起吃饭，却随时要提防各种不测。这不是休息，是一种紧张的劳动，是工作的枯燥乏味的延伸。何况，中心的物质条件还未尽如人意，伙食水准也还不高，更不可能有满足各人胃口的饭菜。家庭式的构想要求医护人员献出更多的爱心，怀抱更崇高的理想。这使已退居二线、担任

名誉主任的伍正谊教授不免产生一种失落感。他尽管相信人生是一个舞台，年青人上去，年老的退下来。但他并不服老。他还有许多理想要去实现。他设想搞一个心理咨询门诊，由心理学老师、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儿科、精神科、神经科医生组成联合门诊，来帮助那些因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不当而产生的种种病态人格，恢复心理健康。他要唤起社会舆论来关心这种患病率比结核病高出两三倍的疾病。他要从医院建筑格调上，从经济上、医疗上、福利上探索建立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疗精神疾病的道路。当然，他也深知，要改变人们的传统看法，也许要等上一百年，但总得有人做起。

这位满头银丝、精神矍铄的老人，这位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专家，这位世界动力精神病学会理事、世界社会精神病学会委员，这位足迹踏遍半个地球、一生都在精神医学的崎岖险道上攀登的学者，他此刻正在想些什么呢？他似乎感到有太多未完成的工作压在肩头。他在茫茫的人海中找寻，找寻接力者，接过这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去继承它、完成它、完美它、发展它。

1990. 汕头